

# 唐代的名茶与流通

〔日〕 布目潮汎 王建 译

## 一、序 言

眼下，我的手边放着在中国旅行时买的名茶“碧螺春”，这是中国土产畜产进出口公司上海市茶叶分公司的产品，可它正式的名字是“洞庭碧螺春”，出产于江苏省苏州地区吴县的大湖周围，在清朝的崇德五年（一六四〇年）曾经作过贡茶<sup>①</sup>的。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叫作“蒙顶黄芽”的名茶，这就是用唐代的一种名茶“蒙顶”之名出现的。

这些虽都称作茶，可是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其中的品种是各式各样的。中国目前也有六大茶之说，把茶分为绿茶、青茶、黄茶、白茶、黑茶、红茶，上述的两种茶都是绿茶。说起绿茶，我国现在饮用的煎茶、玉露、番茶、末茶也可归入这类。绿茶的特点在于采摘之后立即加热杀灭酵素，这叫作“杀青”。不过有点区别，我国杀青时用蒸的办法，而中国则用锅炒（我国九州也有炒的茶）。青茶一般称为乌龙茶，是半发酵的茶，采摘之后并不立刻加热，而是暂时放一放，这叫作“萎凋”，然后与绿茶同样经过揉捻，干燥而制成。黄茶、白茶是轻度的发酵茶，黑茶是自然气化以后的发酵茶，作为一种原料它可放在模子里经过蒸压之后成为压缩茶（也叫作团茶或砖茶、边茶）。红茶在我国也很常用，从制法上说是完全的发酵茶，不加热，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等工序制成。不过下面讲到的唐代名茶，按以上分类的话都是绿茶<sup>②</sup>。

在进入正文论述唐代名茶之前，先就名茶起于何时陈述所见如下。在辽阔的中国出现冠以各地地名的名茶，是茶叶普及的重要佐证，而且只有茶叶流通到遥远的地方才有可能。特别是下面将要提到的那些有关唐代名茶的系统记载，也是考察茶叶流通的重要史料。名茶的最早记录是唐本草，在唐高宗显庆四年颁行的《新修本草》卷一八，菜类、苦菜注引的《桐君药录》有：

西阳、武昌及庐江、晋陵<sup>③</sup>茗皆好。

这句话在唐陆羽的《茶经·七之事》中是作为《桐君录》引用的，最后的“茗皆好”作“好茗”。《桐君药录》三卷，见于《隋书》卷三四、经籍三、子、医方条。矢野仁一氏把它看作“南北朝初期、宋齐时的书”<sup>④</sup>。我认为也可看成是晋代的书，但还没有确证。<sup>⑤</sup>这是因为武昌、庐江见于《晋书》卷一五、地理下，是郡，西阳则见于同书卷一四，地理上，是豫州弋阳郡的属县，但是还没有确证证明晋陵是晋的郡县。然而《晋书·地理下》扬州条云“又以毗陵郡封东海世子毗，避毗讳，改为晋陵”，据《晋书》卷五九，东海孝献王越传，毗之父为越，越受封东

海王时是在永康初年（三〇〇年）以前，所以可以大致认为是有晋陵郡存在的，若将《桐君药录》看作西晋末年以后的书，并没有矛盾。仅此虽然尚不足以断定《桐君药录》为西晋末之书，但上述西阳、武昌、庐江、晋陵作为西晋末之名茶产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此外，矢野仁一氏论述了这四个地方是茶叶产地，可是有关西阳地名的断定还有些问题，矢野氏认为在淮南道黄州，这就难以确定是在今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还是湖北省黄冈地区黄冈县。但是哪一处都可看作茶叶产地。⑥我把见于《桐君药录》的西阳、武昌、庐江、晋陵作为中国最古的名茶产地，并把其年代上推到西晋末年。这是因为西晋末年茶已经很普及，已至于以相当僻远的湖北省为首，包括安徽省、江苏省，或许还有河南省南部各地的名茶曾经名噪一时。

在结束本序言时，再谈谈本文下面将要用到的史料的写作时期。关于《茶经》已经作了考察，根据“八之出”里记载的州县名，其年代在唐肃宗乾元元年（七五八年）至上元元年（七六〇年）之间⑦。不过以后也可能有所增补。

《唐国史补》，唐李肇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〇、子部《唐国史补》条云“书中皆载开元至长庆（七一三——八二四年）间事”，可从其说。所记述事约比《茶经》晚六十年。

《膳夫经》⑧，又名《膳夫经手录》，唐杨晔撰，据《粤雅堂丛书》所收《续谈助》卷五《膳夫经》末尾“西楼”的记载，及以此为基础的清阮元《擘经室外集》卷二的提要，其官为巢县县令（巢县为唐淮南道庐州属县，今安徽省巢湖地区巢县，接近产茶地），则此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八五六年）。因而此书所述事的下限又比《唐国史补》晚大约三十年。篠田统氏《中国食物史》（柴田书店，昭和四十九年）一一二页有关于此书的介绍。

## 二、《茶经》中所见的产地品级

考察唐代名茶的状况，首先可在陆羽《茶经·八之出》中看到把各州分为上、次、下、又下的品级。其中举出了各州所产茶的品级，在注释中又详细记载了生产县等等。各州所产茶的品级如附于本文末尾的“唐代名茶与产地一览表”所示。陆羽在当时是如何取得这些资料的呢？与现存的唐代其他史料相比是很令人惊异的。要作到这一点，如没有各茶叶集散地及其流通是不可能的。此外，怎样将各州的茶分作上、次、下、又下的品级也是问题。而且像此条原注所说“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与峡州、光州同”，在例举州内生产县的同时，也举了县内的著名产地，如这一例中的顾渚山。顾渚山是比较有名的，陆羽晚年曾移居于它附近的苕溪，由此看来他是有可能记述下来的，有关浙西的此类记载之丰富亦可理解。但是，有关剑南（今四川省）的相当详细的部分是怎么作到的呢？而且如上例中的顾渚山谷，与遥远的峡州、光州相同，这样的记载涉及到当时茶产地的广大范围，是如何办到的呢？此外，后代的方志也仅仅是引用《茶经》，而没有对它进行修改以作出全面的评价，这也是不可思议的。《茶经·八之出》中关于茶叶产地的记载实在是令人惊异的。然而，尽管《茶经·八之出》中没有从数量上明确记载八世纪后半茶叶生产的状况，但分析了生产地及品质的概况，应该说这的确是重要的史料。可是《唐国史补》《膳夫经》中的名茶在《茶经》中并不全都评为“上”，这一点下面就会清楚。其原因自然要考虑到时代的差别，但是《茶经》的记载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这一点可以存疑。

### 三、见于《唐国史补》的名茶

《唐国史补》中关于名茶的记叙，最重要的是出于卷下“叙诸茶品目”的下面这段文字。底本为《津逮秘书》、（）内是原注，（1）（2）……（16）是笔者为下文叙述方便而加的。

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1）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2）湖州有顾渚之紫笋。（3）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4）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笋。（5）福州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6）夔州有香山。（7）江陵有南木。（8）湖南有衡山。（9）岳州有滢湖之含膏。（10）常州有义兴之紫笋。（11）婺州有东白。（12）睦州有鸠坑。（13）洪州有西山之白露。（14）寿州有霍山之黄牙。（15）蕲州有蕲门（水？）团黄。（16）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sup>⑩</sup>

关于这个史料，矢野仁一，青木正儿两位已有所阐述<sup>⑪</sup>，下面就（1）（2）……（16）陈述个人见解。

（1）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

“剑南”为唐代十道、十五道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四川省。“蒙顶”即蒙山之顶的意思。蒙山在四川省雅安地区雅安、名山、芦山三县交界处，高度为一四五〇米。《茶经·八之出》剑南条云：“雅州、泸州下（雅州百丈县，名山县<sup>⑫</sup>、泸州泸川县者，与金州同也。）”

（括弧内为原注，下同。）《茶经》没有“蒙顶”之名，并将蒙顶所属的雅州的茶定为下品。因而蒙顶茶在《茶经》之后很快出现了。与《唐国史补》成书时间大致相同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二、西川下、雅州条云：“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证实了《唐国史补》的记载。又《膳夫经》曰：“蒙顶，始蜀茶得名蒙顶也……”。北宋初的《太平寰宇记》卷七七、剑南西道六、雅州名州县条说：“蒙山在县西七十里。……山顶受全阳气，其茶芳香，按《茶谱》云，山有五岭，有茶园，中岭曰上清峰，所谓蒙顶茶也，为天下之称。”这段记载较元和志详细，在北宋初也仍然是天下名茶。上文中的《茶谱》可能是五代的毛文锡所作，全文已不可见<sup>⑬</sup>。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二、果部、茗条的集解中“时珍曰”曾提到“雅州之蒙顶石火露芽，谷芽第一”。如序言所述现今的名茶中也有“蒙顶黄芽”，在《四川茶叶》（一九七七年、四川人民出版社）的第十七章，“几种名茶的制造”，一、“蒙顶茶的制造”一节中除了黄芽而外，还举了甘露、石花、万春银叶、玉茶长春。蒙山的年平均气温为15℃，年降雨量1800~2000毫米，空气湿润，土壤深厚肥沃，可知现在依然有很好的条件。

“石花”之名称未详。关于“小方”，青木正儿氏认为“可能是方形的小饼茶”，我同意这个看法。所谓“饼茶”就是陆羽在《茶经》“二之具”“三之造”中推崇的固形茶，茶叶采摘后，用甑子（蒸笼）蒸，用杵臼捣，再把它放在模子里成形。可能小方的模子是方而小的吧。把它干燥后就成为饼茶，饮用之前先用火烤，再用木碾压成粉末<sup>⑭</sup>。这种饼茶是唐代的代表性茶叶。关于“散牙”，青木正儿氏说是“散茶”，我赞同这一观点。《茶经·六之饮》说“饮有餗茶、散茶、末茶、饼茶者”，餗（同粗）茶是粗糙的茶，即砍伐茶树打下叶子，经过加热、干燥而制成的茶，在我国属于番茶类。散茶比餗茶高级，在我国属于抹茶类。从《茶经·一之源》所说“笋者上，牙者次”看来，散牙之“牙”和笋都是对茶芽的形容。所以散牙意味着用茶芽制成的茶叶。

### （2）湖州有顾渚之紫笋

顾渚山在浙江省嘉兴地区长兴县，接近太湖南岸。《茶经·八之出》云“浙西以湖州上（湖州生长城县顾渚山谷）。”《茶经》已将顾渚山所在的湖州茶定为上品。又《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五，江南道一，浙西观察使、湖州、长城县条曰“顾山，县西北四十二里。贞元以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筍，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山是顾山渚的略称，紫筍与紫笋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贞元（德宗年号，元年为七八五年）以后，开始每年向皇帝进奉，制茶工人达到三万人。又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五、江南道、湖州吴兴郡条，有以“紫筍茶”作土贡的记载，长城县条云“顾山有茶，以供贡”，《膳夫经》说“湖州顾渚湖南紫筍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把紫筍茶作为蒙顶茶的名茶。《太平寰宇记》卷九四、湖州条的土产中有“紫笋菜”，或许是“紫笋茶”之误。如上所述，“顾渚之紫笋”作为唐代名茶与蒙顶茶一起出现在唐代的记录中，是唐代头等名茶。此外《唐国史补》卷下的“虏帐中烹茶”有“此顾渚者”，下文就要谈到。顾渚茶又常出现于唐代文学作品中，被黄巢杀死的皮日休的《松陵集》卷四“茶中杂咏”第二首，有茶人“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的句子，在与皮日休“茶中杂咏”相酬答的陆龟蒙的《唐甫里先生文集》卷一六，收有他的自传《甫里先生传》说“先生嗜茶，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入茶租十许，薄为瓠觥之费。”可见当时的风雅人物在顾渚山下有自己的茶园。陆龟蒙是姑苏（江苏省苏州地区吴县）人，那里隔着太湖同顾渚山遥遥相对。

### （3）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

“东川”，《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三，剑南道下有东川节度使条，即此东川。东川节度使辖州有绵州，绵州是今四川省绵阳地区绵阳县。绵州的辖县中有昌明、神泉二县，所以应读作“神泉的小团，昌明的兽目”。《膳夫经》中也可见到“东川昌明茶”之说，《唐国史补》中也有“此昌明者”。但是《茶经·八之出》剑南条云“绵州，蜀州次（其西昌、昌明、神泉县西山者并佳。）”称绵州为次品，而又说西昌、昌明、神泉所产茶为佳。宋本《白氏文集》卷三六，春尽日中有“醉对数丛红芍药，渴尝一碗绿昌明（原注：蜀茶之名也）。”

宋代杨伯岳《臆乘》茶条有“东川曰兽目”，《本草纲目》卷三二，茗条有“东川之神泉兽目”，可能是“昌明兽目”之误，或者明代另有“神泉兽目”这一名茶吧。

所谓“小团”可能是小型团茶之意，当时也许称饼茶为团茶。关于“兽目”，诸冈存氏认为得名于兽目山的山名，但未见出处。

### （4）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箬

峡州州治在今湖北省宜昌市，《茶经·八之出》曰“山南以峡州上（峡州生远安、宜都、夷陵之县山谷。）”峡州茶在《茶经》中亦定为上品，《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山南道，峡州条的土贡中有“茶”。《膳夫经》曰“峡州茱萸箬得名，近自长庆（穆宗年号，八二一～八二五年）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箬矣。”可知茱萸箬出于穆宗长庆（八二一～八二五年）年间，不久夷陵的小江源茶在质量上超过了茱萸箬，虽然数量还不多。另外，这段文字中虽也出现了碧涧茶、明月茶的名称，但没有芳蕊茶。<sup>⑩</sup>明孙大绶《茶谱外集》中所收宋初吴淑（正仪）的《茶谱》“碧涧纪号”的自注，引用了五代毛文锡《茶谱》：“有水江园（即《膳夫经》中“小江源茶”？）、明月箬、碧涧箬、茱萸箬。”这段话里有明月箬、碧涧箬，仍不见芳蕊。箬，《周礼·地官·牛人》“其盆箬以待事”下郑司农注里说“箬，受肉笼也”，所谓箬就是篮。或许在峡

州，茶是装在箬（竹篮）中运输的，所以才在茶名上加了箬来称呼的吧。又如毛文锡《茶谱》中所见，不但茱萸箬，连明月、碧涧也加上了箬来称呼，可能这才是正确的。

关于“明月”这一名称，《大清一统志》卷二七三、宜昌府、山川条有明月峡，或许是由此而得名的。若是这样的话，“碧涧”的得名大概也是同样，可是还没有明证。关于“芳藎”及“茱萸箬”的名称，眼下还没有线索。此外，《本草纲目》卷三二，茗条云“硤州之碧涧，明月”，硤州或许是峡州之误。

#### （5）福州有方山之露（一作生）牙

福州即现在的福建省福州市，《茶经·八之出》：“岭南生福州……（福州生闽县方山之山阴也）”，这个方山当即《唐国史补》中的方山。《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道，福州长乐郡条土贡中有“茶”，《太平寰宇记》卷一〇〇，江南东道，福州条里茶也是作为土产，闽县条下有“方山在州南七十里，周迴一百里，山顶方平，因号方山”，即为此方山，但没有关于茶的记载。《膳夫经》记述不同，作“福州生黄茶”。宋杨伯岳《臆乘》说“福闽曰生芽、曰露芽”，芽与牙通，这里露牙，生牙两种都提到了，与“一作生”相比，似乎应当作“福州有方山之露牙，生牙”。《本草纲目》卷三二，茗条下有“福州方山之集芽”，集芽或许是方芽之误。

#### （6）夔州有香山

夔州即今四川省万县地区奉节县。《茶经·八之出》中不见夔州之名，大约是《茶经》以后的新产地。《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山南道，夔州土贡中有茶。夔州在长江之峡，《膳夫经》峡州条中“峡州香山茶”当指夔州的香山茶。

#### （7）江陵有南木

“江陵”，《新唐书》卷四十，山南道条有“江陵府江陵郡、本荆州南郡，……县八。江陵，……”，为今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茶经·八之出》云“山南……襄州·荆州次（荆州生江陵县山谷）”。定荆州为次品。《膳夫经》“潭州茶”条曰“江陵南木香茶（凡下）”，都没有给它较好的评价。

#### （8）湖南有衡山

《茶经·八之出》说“山南……衡州下。（生衡山、茶陵二县山谷）”，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衡山属江南道黔中采访使，是今湖南省衡阳地区衡山县，作为五岳之一的南岳而闻名。因它位于洞庭湖之南，所以称为“湖南”。《膳夫经》有“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饼茶以大串为特征，收获量也很大。宋吴淑《茶谱》“或侔团月之形”自注中引毛文锡《茶谱》有“衡州之衡山……研膏为之，皆片团如月。”饼茶形状呈月形也是其特色。

#### （9）岳州有溇湖之含膏

岳州茶不见于《茶经》，是《茶经》以后新出现的。《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道黔中采访使条曰“岳州巴陵郡”，州治在巴陵，即现在湖南省岳阳地区岳阳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七，江南道三，岳州巴陵县条云“溇湖，一名翁湖，在县南一十里。”《膳夫经》说“岳州溇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于茱萸箬。”产量虽少，品质却不错。宋吴淑《茶赋》亦曰“复闻溇湖含膏之作”，直至宋初溇湖茶还有名气。

#### （10）常州有义兴之紫笋

常州为今江苏省常州市。《茶经·八之出》云“浙西……常州次（常州义兴县，生君山悬脚岭北峰下，与荆州义阳郡同……）”《茶经》虽将常州定为次等，却还是详细记述了义兴县

的产茶地。《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道，东道采访使条下常州晋陵郡的土贡中有“紫筍茶”。《膳夫经》云“崇（常之误）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义兴县至宋代改作宜兴（《太平寰宇记》卷九二作常州宜兴县，大约是避宋太宗光义名讳之故。）可是虽然多产，却不能算作好茶。唐杜牧（八〇三～八五三年）有“题宜兴茶山诗”（《杜樊川集》卷三），唐代也作宜兴，大概是由于和上述相同的理由<sup>⑩</sup>。宋扬伯岳《臆乘》曰“湖常俱曰紫筍”，则紫筍茶之名一直延续到宋代。

#### (11) 婺州有东白

《茶经·八之出》说“浙东……明州、婺州次（婺州东阳县东白山<sup>⑪</sup>，与荆州同）。”以婺州茶为次等。婺州即今浙江省金华地区金华县。东白山，据《大清一统志》卷二三一，金华府条下曰“东白山，在东隅县东北八十里；高七百三十丈，周五十里。”吴淑《茶谱》“香浮碧乳”条自注中引毛文锡《茶谱》有婺州的“举岩茶”，未提及东白，或许五代时东白茶已衰亡。《膳夫经》中亦只见婺州茶，没有东白之名。

#### (12) 睦州有鸠坑（坑同坑）

《茶经·八之出》有“浙西……睦州，歙州下。”作为下等。睦州鸠坑在今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道、东道采访使条中，睦州新定郡土贡下举有“细茶”。《膳夫经》有“睦州鸠坑，茶味薄”。《太平寰宇记》卷九五、江南东道七、睦州土产下提到了“鸠坑团茶”，可知宋初仍保存着这一名茶的名字。明代《本草纲目》卷之二，茗条下也有“睦州之鸠坑”。饶有兴味的是如今在优质茶树品种中，仍然可以举出浙江省淳安县的“鸠坑种”。<sup>⑫</sup>

#### (13) 洪州有西山之白露

洪州茶不见于《茶经·八之出》，《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道，黔中采访使条的“洪州豫章郡”即指此，州治在今江西省省会南昌市。《大清一统志》卷二三八、南昌府条有“西山称南昌山”，《太平寰宇记》卷一〇六、江南道、洪州、南昌县条云“南昌山，在县西三十五里，高二千丈，周回三百里。……山中有洪井，飞流悬注，其深无底。”这个洪井，就是唐张又新《煎茶水记》所说的“洪州西山西东瀑布水第八”。西山又是道家十二洞天所在地。“西山之白露”，宋吴淑《茶谱》作“西山白露”，自注中引毛文锡《茶谱》作“洪州西山之白露”。同时在“柏岩兮鹤岭”的自注中所引毛文锡《茶谱》作“又洪州西山白露尺（及？）鹤岭尤佳”。在五代、宋代仍然是名茶。此外，宋代《臆乘》中也有“豫章曰白露，曰白芽”，豫章即洪州。明《本草纲目》卷三二，茗条也有“洪州之白露”。

#### (14) 寿州有霍山之黄芽

《茶经·八之出》云：“淮南……寿州下（盛唐县生霍山者，与衡州同也）”，《新唐书》卷四一、淮南道条中云：“寿州寿春郡”，其土贡里有“茶”，属县中有霍山县，其他有霍山。霍山县为今安徽省六安地区霍山县。《膳夫经》曰“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比《茶经》所说的小品有所提高。《册府元龟》卷四九三，邦计部、山泽一曰“（元和）十一年（八一六年）讨吴元济。二月，诏寿州，以兵三千保其境内茶团。”可以认为寿州霍山大约有宫廷用茶园。宋代《臆乘》有“寿州曰黄芽”，明代《本草纲目》卷三二、“茗”条也有“寿州霍山之黄芽”，从宋代到明代都保存着这个名字。

#### (15) 蕲州有蕲门（水？）团黄

《茶经·八之出》云“淮南……蕲州、黄州又下。”《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淮南道蕲州

蕲春郡的土贡内有“茶”。由于其属县中有蕲水县，《膳夫经》又有“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者并方斤厚片……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至百余片。”因而“蕲门”或许为“蕲水”之误。蕲水为今湖北省黄冈地区浠水（改名为蕲水）县。“蕲水团黄”是“方斤厚片”、“团薄饼”这很难解。方斤可能是说块状茶的形状为方形吧。关于“团黄”，青木正儿氏<sup>②</sup>将黄与《茶经·五之煮》的“其色细（淡黄）也”联系起来解释，可是我以为这个细是指沏茶时的颜色，其团黄应看作块状茶的颜色。《本草纲目》卷三二，茗条中有“蕲州蕲门团面”，大概“门”为“水”之误，“面”为“黄”之误。

(16) 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焉”一本作“第”）。

《茶经·八之出》中未见浮梁的记载，但是《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道，黔中采访使，饶州鄱阳郡属县中有浮梁县，饶州土贡内有“茶”。其地在今江西省景德镇市。《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江南道四，饶州、浮梁县条云“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与其说浮梁是茶产地，不如说是茶的大集散地。见于《白氏文集》卷一二的有名的《琵琶行》中，昔日长安倡女今日商贾妇人叹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即指此事。《膳夫经》说“饶州浮梁茶，……其于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产量虽多，味并不佳。《宋会要》食货二九中有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的产茶额，饶州的鄱阳、浮梁、德兴三县为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五斤，与此相比同属江南东路的宁国府为一一二万斤，徽州为二一七万斤，至南宋时浮梁茶似乎有所衰落。

下面举《唐国史补》卷下“虏帐中烹茶”中所见的记载。

(17)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濠湖者。”

“常鲁公”被解释为姓常而受封为鲁国公的人。常衮（《旧唐书》卷一一九、《新唐书》卷一五〇）没有出使过吐蕃，并且他是河内郡公，而非鲁国公。《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十二月条有“入蕃使判官常鲁”的名字，所以此文中“常鲁公”、“鲁公”之“公”字大约是衍文。如果是常鲁的话，这段记载就是建中二年的事情。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说茶“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亦足怪焉。”封演为天宝十五年（七五六年）进士（《登科记考》卷九），建中时或许尚在世，此记载为开始向回鹘输入茶叶的情况。因而，此时吐蕃已输入茶叶并不足奇，然而吐蕃赞普收罗了这样多的中国名茶却让人惊讶，这里所举的名茶可以看作当时名茶的史料了（a）寿州即上述（14）中寿州霍山之黄牙，（b）舒州即《茶经·八之出》淮南条所说的“舒州次”（安徽省安庆地区潜山县），（c）顾渚即（2）中所述湖州顾渚之紫笋，（d）蕲州是（15）中的蕲州蕲门（水？）团黄，（e）昌明为（3）所述东川的昌明兽目。

要之，《唐国史补》中所见的名茶除去浮梁有十六种，本文末尾与《膳夫经》的名茶一道编入“唐代的名茶及其产地一览表。”

#### 四、《膳夫经》所见名茶及其流通

关于唐代的名茶，《膳夫经》是仅次于《茶经》、《唐国史补》的重要史料，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可以据之了解名茶流通地的大致状况。本文所用《膳夫经》的版本以清末方功惠《碧琳琅馆丛书》丙部（简称《碧》）所收的为底本，参考《粤雅堂丛书》三编第二十三集（简称《粤》）及十万卷楼丛书三编（简称《十》）所收《续谈助》卷五，举其主要异同，摘其要点。（1）、（2）……（20）为笔者所加。

（1）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sup>①</sup>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茗丝<sup>②</sup>盐铁管榷存焉。今江夏以东，淮海之南，皆有之，今略举其尤处，别为二品总焉。

【异同】<sup>①</sup>稍稍——《碧》作“稍”，《粤》、《十》作“稍稍”。<sup>②</sup>茗丝——《粤》作“名丝”，《十》作“名系”。

这里首先须注意的是把茶的普及定为“晋宋以降”，而未言及汉代饮茶之事。而且把茶煮出来的东西称为“茗粥”。这个资料可以说明《茶经·七之事》中引用的西晋傅咸“司隶教”中“茶粥”就是“煮茶”。其次认为关于唐代饮茶的普及是在玄宗的“开元天宝之间”渐渐普及，肃宗、代宗的“至德、大历”年间增多，德宗的“建中以后”盛行，所述饮茶普及的详细过程为他处所未见。另外，将产茶地说成江夏（湖北省武汉市）以东、淮海（《尚书·禹贡》有“淮海惟扬州”，淮海为江苏省扬州市）以南地区，这里不包括江夏以西，特别是蜀（四川省），与后面记述亦有矛盾。

（2）新安茶，今蜀茶也，与蒙顶不远。但多而不精，地亦不下，故析而言之，犹必以首冠诸茶。春时，所在吃之皆好。及将至他处，水土不同，或滋味殊于出处。惟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味不变，由此尤重之。自谷雨以后，岁取数百万斤<sup>①</sup>，散落东下，其为功德也如此。

【异同】<sup>①</sup>数百万斤——《碧》作“数百斤”，《十》、《粤》作“数百万斤”。

这是把蜀茶称为“新安茶”的最早史料。在《唐国史补》中，称蜀茶为蒙顶茶，又称东川茶。新安茶不知产于何处，但既与蒙顶不远，那么也可知大概了。不过，新安茶产量虽多，品质却并不好。这一条格外引人注意的是新安茶“南走百越”，因而可到蜀南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北方“临五湖”是指什么地方呢？“五湖”与“百越”对举，可能也是“五胡”之误，可是笼统地从“五湖”看是弄不清楚的，似乎不是指蜀的北方，据说其间滋味不变。而且谷雨（阳历四月二十日）以后左右，每年有高达数百万斤的产量。它“散落东下”，这句话也不好解，与后面所述的流通地区比较，看来并未流向蜀以外的地方。我根据这一条认为，蜀茶大体以蜀（四川盆地）为流通中心，尚未到达现在的湖北省或者陕西省。

（3）饶州浮梁茶<sup>①</sup>，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其余济人，百倍于蜀茶，然味不长于蜀茶。

【异同】<sup>①</sup>浮梁茶——《粤》无“茶”字。

关于浮梁茶，请参照《唐国史补》（16）“浮梁”条。这里令人吃惊的是浮梁茶的渗透情况。甚至于关西、山东的“闾阎村落”都吃它，而且“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这说明原书著者汤晔很注意表现饮茶的普及与渗透情况，同时也对浮梁茶流通到今天的陕西、直至河南、河北、山东各省农村的各个角落而感到吃惊。

（4）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以上三处出处者，并方斤厚片，自陈蔡以北，幽并以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



关于“蕲州茶”，请参看《唐国史补》（15）。鄂州在今湖北省咸宁地区武昌县。关于“鄂州茶”，《茶经·八之出》中江南条曰“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膳夫经》后文内有“鄂州团黄”。而“至德茶”在《茶经》、《唐国史补》中皆无记载。关于至德，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黔中采访使，池州属县条载，至德二年（七五七年）分鄱阳、秋浦两县而设置的。蕲州、鄂州、至德三地的茶以方形饼状较厚为特色。此三茶的流通地区为陈、蔡，即今河南省南部驻马店地区的确山、遂平、上蔡、汝南、新蔡各县附近以北，幽（北京市附近）、并（山西省太原市附近）以南的广大范围，而其数量比浮梁茶有成倍的扩大。

（5）衡州衡山，团饼而巨串，岁收千万，①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其有②先春好者，在湘东皆味好③，及至湖北④滋味悉变⑤，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功亦不细。

【异同】①千——《十》作“十”。②有——《碧》无此字，《粤》、《十》有。③味皆好——《粤》作“甘味”，《十》作“甘味好”。④湖北——《碧》无此字，《粤》、《十》作“湖北”。⑤“变”字下《粤》、《十》有“然”字。

有关衡州衡山茶，请参看《唐国史补》（8）湖南衡山。此种茶的特色是大串的饼茶，产量亦很高。其流通地区，从潇湘即湖南省零陵地区的潇江与湘江的汇合点，到五岭即广东、广西境内，甚至到达交趾，即今越南南部，这也是最早的史料。

（6）潭州茶，阳团茶（粗恶）、渠江薄片茶（有①油苦硬），江陵南木香茶（凡下），施州方茶（苦硬），已上四处，悉皆味短而韵卑。惟江陵襄阳，皆数千②里食之，其他不足记也。

【异同】①有——《碧》作“由”，《粤》、《十》作“有”。②千——《十》作“十”，《粤》作“千”。

潭州为今湖南省长沙市。“潭州茶”的记载不见于《茶经》、《唐国史补》，“阳团茶”亦未详。“渠江薄片”见于宋吴淑《茶赋》，渠江流经今湖南省黔阳地区靖县、会同县，注入沅江，此茶当产于这一带。“江陵南木”请参看《唐国史补》（7）“江陵南木”。关于“施州方茶”，《茶经》、《唐国史补》皆未载。施州为湖北省恩施地区恩施县。方茶可能是方形的饼茶。这四种潭州茶味均不佳。其流通情况是从江陵，即湖北省荆州地区江陵县推广到襄阳，即上溯汉水到达襄阳地区。

（7）建州大团，状类紫筍，又若今之大胶片，每一轴十余斤。将取之，必以刀刮，然后能破。味极苦，唯广陵山阳两地人好尚之，不知其所以然也。或曰：疗头痛。未详。（已上以多为贵）

关于建州，《茶经·八之出》岭南条举有建州，云“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江南东道采访使条有“建州建安郡”，是今福建省建阳地区建瓯县。至宋代，这里的北苑成为著名的宫廷茶园，北宋末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有详细记载。紫筍同紫笋，《唐国史补》（2）“湖州有顾渚之紫笋”、（10）“常州有义兴之紫笋”，《膳夫经》（9）“湖南紫笋茶”与此相当。“大团”也许是说团饼的特色是大。此建州大团据称为“广陵、山阳”两地人所喜好。广陵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山阳为江苏省淮阴地区淮安县，可知建州茶流通于这两个地方。

（8）蒙顶（自此已降，言少而精者），始蜀茶得名蒙顶也①，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②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新③安草

市，岁出千万斤。虽非蒙顶，亦希颜之徒。今真蒙顶有鹰嘴牙、白茶供堂，亦未尝得上者，其难得也如此。又尝见书品论展笔工，以为无等可居第一。蒙顶之列茶间，展陆之论，又不足论也。

【异同】①也——《碧》作“於”，《粤》、《十》作“也”。②规——《粤》作“视”。

③新——《粤》、《十》作“斯”。

关于蒙顶茶，《唐国史补》（1）已有所述。至于“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了解宪宗元和（元年为八〇六年）以前蒙顶茶价格的重要史料。所谓“束帛”，是见于《仪礼·士冠礼》的聘问用礼物，据注疏说其数定为“十端”，《周礼·春官·大宗伯》“孤执皮帛”条唐贾公彦疏云“束者十端，端丈八尺”，十端为十八丈。四丈是一匹，所以十八丈为四点二匹。贞元十年（七九四年），绢一匹为一千五百文~一千六百文<sup>②</sup>，因而若一匹为一千六百文，则四点二匹高达六千七百二十文，而一斤先春蒙顶价值帛十端（四点二匹）以上。唐代一斤一般是五九六克，由此可以判明蒙顶茶价高到什么程度。然而如《膳夫经》（2）中所见，这种蒙顶茶的数量不过几十年之间就被“新安茶”压倒。值得注意的还有这一条里的“新安草市”，从这一词语中可以看出茶叶草市的例子<sup>③</sup>。上品中难得的“真蒙顶”中有“鹰嘴牙”和“白茶供堂”。唐薛能（大中末年，八六〇年，书判入等）《薛许昌诗集》卷七四说“蜀州郑使君寄鸟嘴茶因以赠答八韵”，鸟嘴牙大约是和鹰嘴牙同样的。白茶供堂是“白茶”与“供堂”，还是“白茶供堂”还不清楚。

（9）湖州<sup>①</sup>顾渚，湖南紫筍茶。自蒙顶之外，无出其右者。

【异同】①《碧》作“湖顾渚”，《十》《粤》作“湖口顾渚”，据今意改作“湖州顾渚”。

关于此项请参照《唐国史补》（2）。“湖南”的说法可能是因为地处太湖之南。可知这种紫筍（筍）茶是次于蜀蒙顶茶的天下第二名茶。

（10）峡州茱萸箬得名，近自长庆稍稍重之，亦顾渚之流也。自是碧涧茶、明月茶、峡中香山茶，皆出其下。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虽所出至少，又胜于茱萸箬矣。

关于峡山茶，请参照《唐国史补》（4）。此条虽例举了未见于《唐国史补》（4）的“峡州香山茶”，但这可能与《唐国史补》（6）的夔州茶为同一物。又提及最近（宣宗大中十年，八五六年）出现的夷陵“小江源茶”，这或许如《唐国史补》（4）所述，与毛文锡《茶谱》的“水江园”为同一物。小江源茶产量虽少，但引人注意的是质量胜于茱萸箬。夷陵作为茶叶生产县见于《茶经·八之出》，即今湖北省宜昌市。

（11）舒州天柱茶，虽不峻拔遒劲，亦甚甘香芳美，良<sup>①</sup>可重也。

【异同】①良——《碧》无，《十》、《粤》作“良”。

关于舒州茶，请参照《唐国史补》（17）。《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五，淮南道三，舒州，怀定县条云“潜山县在县西北二十里，其山有三峰，一天柱山。”“天柱茶”或者因此得名。唐末韦庄的《又玄集》卷中，薛能条有“谢淮南刘相公寄天柱茶”诗，其句为“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维扬即今江苏省扬州市，因此，这种天柱茶也许就标志着它是从舒州，即安徽省安庆地区潜山县运往大运河中心地带扬州去的。可是这首诗未载于《唐人八家诗集》本的《薛许昌集》。此外，唐秦韬玉（中和二年，八八二年及第）的《采茶歌》（《文苑英华》卷三三七、歌行、草木、茶）中有“天柱香芽露香发”句，天柱茶是唐代名茶。

（12）岳州沩湖，所出亦少，其好者可企于茱萸箬。此种茶性<sup>①</sup>有异，唯宜江水煎。

得井水煎<sup>②</sup>即赤色而无味。(13)蕲州蕲水团黄,团薄饼,每斤至百余片<sup>③</sup>,率不甚粗弱。其有露消者,片尤小而味甚美。(14)寿州霍山小团,其绝好者,止<sup>④</sup>于汉美。所阙者,馨花颖脱。(15)睦州鸠坑,茶味薄,研膏绝胜霍山者。

【异同】①性——《碧》作“性”、《粤》从“性”。②煎——《十》、《粤》无,《碧》同。③片——《碧》作“斤”,《粤》从“片”。④止——《十》作“上”。

有关(12)岳州漉湖茶,(13)蕲州蕲水团黄,(14)寿州霍山小团,(15)睦州鸠坑,请分别参看《唐国史补》(9)、(15)、(14)、(12)。

(16)福州生<sup>①</sup>黄茶,不知在彼味峭口。上下及至岭北,与香山,明月为上下也。

【异同】①生——《十》作“正”。

关于福州茶,请参看《唐国史补》(5),但其中未记述“黄茶”。此条中说“上下及至岭北”,岭北是相对岭南而说的,所以可看作今江西省湖南省南部一带。据此可以了解福州茶的流通地区。

(17)常<sup>①</sup>州宜兴茶,多而不精,与鄂州团黄为列。(18)宣州鹤<sup>②</sup>山茶,亦天柱之亚也(19)东川昌明茶,与新安含膏争其上下。

【异同】①常州——《碧》、《十》、《粤》皆作“崇”,今据意改。②鹤——《十》、《粤》作“鸭”,《碧》作“鹤”。

有关“常州宜兴茶”,请参照《唐国史补》(10)。“宣州”在《茶经·八之出》中为“宣州下”,即今安徽省芜湖地区宣城县。《茶经》宣州条注云“宣州生宣城县雅山,与蕲州同”,此雅山疑又称鹤山,尚未明确。《太平寰宇记》卷一〇三,江南西道、宣州、宁国县条有“鹞山出茶,尤为时贵,《茶经》云,味与蕲州同”,由此可见雅山又称鹞山。宋吴淑《茶赋》说“柏岩兮鹤岭”,疑鹤岭即鹤山,但尚无明证。“东川昌明茶”之事请参照《唐国史补》(3)。

(20)歙州、婺州、祁门<sup>①</sup>、婺源方茶,制置精好,不杂不叶。自梁宋幽并间,人皆尚之,赋税所入,商贾所资,数千里不绝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顾渚茶品之亚列。祁门<sup>①</sup>所出方茶,川源制度略同差小耳。

【异同】①祁——《十》、《粤》、作“祈”,祁门、祈门同。

关于歙州茶,《茶经·八之出》“浙西”条下作“歙州下”。歙州为今安徽省徽州地区歙县。关于歙州茶,请参看《唐国史补》(11)。婺州即今浙江省金华地区金华县。“祁门”又写作“祈门”,在唐代是江南道,西道采访使歙州的属县,于永泰二年(七六六年)新设置。《茶经》中还未见祁门茶的记载。祁门即今安徽省徽州地区祁门县。至今祁门红茶(祁红)仍然作为中国红茶中的最优产品而闻名。婺源在唐代是歙州属县,关于婺源茶,《茶经·八之出》的“浙西歙州”条说“歙州生婺源山谷,与衡州同”,即今江西省上饶地区婺源县。以上四地的方茶在梁(河南省商丘市)、宋(河南省洛阳地区临汝县),幽(北京市附近)、并(山西省太原市)等地很受欢迎,商贾贩运不绝于道路。这如实地展示了茶叶通商于遥远外地的情形。诸家<sup>②</sup>已经引用的《文苑英华》卷八一三,张途的《祈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云“祈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贾银缙缙素衣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这条史料所反映的运销何处的情况也很引人注意。而且张途在咸通三年(八六二年)任歙州司马<sup>②</sup>,可以认为上文的写作时间与《膳夫经》约略相同。

##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首先将见于《茶经·八之出》州别的上、次、下、又下的品级，见于《唐国史补》卷下的“叙诸茶品目”和“虏帐中烹茶”的记载，见于《膳夫经》、《新唐书·地理志》“土贡”条茶的史料里关于唐代名茶的情况，制成“唐代的名茶及其产地一览表”（本刊从略）。

据这个一览表，在《茶经》中定为上品茶的产地，而《唐国史补》、《膳夫经》和《新唐书·地理志》“土贡”中未见记载的州有淮南道的光州，江南道越州，剑南道彭州。相反，《茶经》定为“下”“又下”等级，而《唐国史补》、《膳夫经》、《新唐书·地理志》“土贡”中出现的，有山南道的金州、梁州。淮南道寿州在《茶经》中品级为“下”，但《唐国史补》、《膳夫经》、《新唐书》“土贡”亦有其名，与此相同的又如蕲州，也被《茶经》定为“又下”。此外，江南道睦州在《茶经》的品级作“下”，可《唐国史补》、《膳夫经》中有坞坑茶之名，又载于《新唐书》“土贡”中。还有江南道的宣州，《茶经》中作“下”，而《膳夫经》中记有鹤山茶，同样的又如歙州、《膳夫经》中作歙州茶、祁门茶、婺源茶的产地。衡州也是如此，虽在《茶经》中定为下品，可《唐国史补》、《膳夫经》有产衡山茶的记载，施州未见于《茶经》，而《膳夫经》则有施州方茶的记载。剑南道雅州在《茶经》中作“下”，可是在《唐国史补》、《膳夫经》中却是蒙顶茶的产地，又见于《新唐书》“土贡”。这当中有许多是在《茶经》之后迅速出现的，蒙顶茶即为一例。

《膳夫经》中有关茶的记载，几乎未提到前代已有的史料，所以可以举出几点新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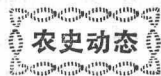
首先，关于中国饮茶普及的过程：（1）其普及不始于汉代，而始于晋宋以后的吴人。

（2）唐代茶叶的普及可分作①开元天宝年间，②至德大历年间，③建中以后三个阶段。最后例举了未见于《茶经》及《唐国史补》的新名茶：①新安茶、②至德茶、③潭州茶、④建州大团、⑤峡中香山茶、⑥小江源茶、⑦天柱茶、⑧祁门茶。另外，有关蒙顶茶每斤高达六千七百二十文的史料也很重要。

《膳夫经》的史料最重要的是可判明名茶行销的八条路径。这八条路径是：①新安（四川省）茶北向五湖、南往百越的流通，如同现在四川边茶。五湖虽尚未明（或是五胡），但既说百越，不是指流通到长江下游或其他地区，可理解为蜀茶仅流通于剑南。当然，象蒙顶茶那样的名茶也有少量流通得广一些。②至德（安徽省南部）茶、蕲州茶、鄂州（湖北省）茶从陈蔡流通到幽（河北省）及并（山西省）。③衡山（湖南省）茶向南方流通到湘潇、五岭、交趾。④潭州（湖南省长沙）茶向江陵、襄阳（皆湖北省）流通。⑤浮梁（江西省）茶广泛流通于关西、山东。⑥歙州、婺州、祁门、婺源（浙江省、安徽省交界一带）茶从梁、宋（河南省）流通于幽（河北省），并（山西省）。⑦建州（福建省）茶流通于广陵、山阳（江苏省北部）。⑧福州（福建省）茶向岭北（江西省，湖南省南部）的流通。以上八条道路图示如“唐代名茶流通路线图”<sup>⑤</sup>。至于这八条道路具体经过的路线虽还不甚明瞭，但可以根据唐代的交通线作大致的推断<sup>⑥</sup>。由于这些流通路线是各产地茶叶特定的，可能与一般物资流通于远方的路线有所不同吧。但是唐代物资的流通路线，运销远方的实际情况，还不能说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前未注意的《膳夫经》中的这些路线，今后也可作为判明唐代商路的一个重要史料。

## 注释:

- ①《农业辞典》(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〇六页。
- ②关于六大茶的分类,请参照安徽农学院主编《制茶学》(北京、农业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一章茶叶分类。
- ③“晋陵”的“陵”字,据日本的传抄本《饗喜庐丛书》本难以识读。《茶经·七之事》中多写作“昔陵”,《明抄说郛》(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卷八三作“晋陵”,是正确的。
- ④矢野仁一:《关于茶的历史》(创元社《茶道全集》卷一、茶说茶史篇)六三页。
- ⑤布目潮颯:《茶经》(平凡社 东洋文库《中国的茶书》)一二六页。
- ⑥关于“西阳”地名的断定,请参照《晋书注》地理志的条目。
- ⑦布目潮颯:《茶经著作年代考》(《立命馆大学文学部创设三十周年纪念论集》昭和之二年)。
- ⑧关于《膳夫经》,篠田统《中国食物史》(柴田书店,昭和四十九年)一一二页有介绍。
- ⑨“唐代的名茶及其产地一览表”所依据的《茶经》,以谈交社《茶道古典全集》第一卷(昭和三十二年)所收的抽稿《茶经》中的《宋咸淳刊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各种版本有所不同,取其可从者。以下《茶经》引文同此。
- ⑩《津逮秘书》一本“焉”作“第”。
- ⑪见矢野仁一《关于茶的历史》六九页,青木正儿《中华茶书》(全集第八卷)“茶事拾遗”(6)中有唐代诸茶品的日语译文及注释。
- ⑫《茶经》中此条原文有错乱,据意改。请参照《中国的茶书》一四〇页。
- ⑬关于《茶谱》,请参看青木正儿《中国茶书》茶谱条。
- ⑭关于《茶经》中所见的饼茶,请参照抽稿《中国的茶书》一五页,以及同书《茶经》的“二之具”、“三之造”。
- ⑮见诸冈存《茶经评释》卷二(昭和十六年、茶业工会中央会议所)一八二页。本书有出版科学会研究所的再刊本。
- ⑯“簦”,青木正儿氏《中华茶书》茶谱(辑佚)条作“簦”,字典中无此字。
- ⑰宋代陈思《宝刻丛编》中有“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这条史料,与《茶经》所述也有矛盾,这里仍使用。
- ⑱“东白山”,《茶经》各本均作“东目山”或“东自山”,都是“东白山”之误。参照抽稿《中国的茶书》一四二页及注(9)。
- ⑲见前注《农业辞典》七八七页。
- ⑳见青木正儿《中华茶书》茶谱,(11)蕲门的团黄的注(2)。
- ㉑见佐藤武敏《中国古代绢织物史研究》下(风间书房,昭和五十三年)四九二页。
- ㉒日野开三郎《续唐代邸店的研究》二〇八页说“未见茶市的例子”,这个“新安草市”不就是例子吗?
- ㉓见日野开三郎前书的二〇七页。又见斯波义信“宋代徽州地区开发”(《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集》山川出版社)二二五页。
- ㉔见《全唐文》卷八〇三,张途小传。
- ㉕此路经图,是大阪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院生妹尾达彦君据笔者意图所作的。
- ㉖关于唐代的交流道路,请参看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地志地图研究》(吉川弘文馆)第一篇,“唐宋时代的交通”,第一,“唐代的陆路”。



## 福建筹建茶艺馆

福建省博物馆等4个单位共同筹办的福建茶艺馆,已接近全面竣工,并于今年9月间作预备性内部开放。

福建茶艺馆首期工程占地面积400平方米,主体建筑为反映各主要茶区特色的一楼四厅,馆内还设置蔡襄的《茶录》碑亭,反映著名惠安石雕艺术的“乌龙喷泉”以及用福建名茶“铁观音”、“大红袍”等神话传说为素材的大型茶事壁画,直径达1.25米的世界最大的德化瓷茶壶,集中海内外书画名家以茶文化为主题的“茶艺画廊”等景观。

此外,馆内还将展出反映福建茶史和历代民间饮茶风习的文物、照片和音像资料。配合展出,训练有素的茶艺小姐将为客人表演有浓郁地方色彩的福建民间品茶艺术,如“闽南工夫茶”、“将乐擂茶”、“福州花茶”等品茗艺术。(陈龙)